

# 明清山区资源开发特点述论

## ——以秦岭—大巴山区为例

张 建 民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张建民(1959-),男,河南长葛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清经济史、社会史研究。

〔内容提要〕 山区开发是明清时期资源开发的重要内容。以秦岭—大巴山区为例:资源开发活动的大规模展开,与全国性人口急剧增长、生存压力增大以及玉米、红薯、马铃薯等新作物的引进、推广等背景、条件紧密相关,并由此表现出资源开发以外来流移为主体;开发过程中存在着显著的盲目过度倾向、资源开发以及以农耕为主体的经营粗放化、经济增长不稳定等明显特点,以致山区经济发展后劲严重不足,较早出现了阶段性停滞、衰退的趋势,发人深思。

〔关键词〕 山区资源;流移人口;盲目开发;不稳定性

〔中图分类号〕 F 30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1999)06-0120-05

明清时期秦岭—大巴山区的资源开发引人注目,一时可谓轰轰烈烈。然而,到了清代后期却又呈急剧衰退趋势。这个过程不能不发人深思,如众所周知,明清秦巴山区的开发是在前代全国性垦殖程度很高的基础上开展的。同时,明清时期大规模垦殖的启动是在全国性人口膨胀、巨大的生存压力驱动下开始的。加之明清特别是清代,秦巴山区的农业垦殖得以大规模进行并在一个时期内取得显著效果,玉米、马铃薯、红薯等新作物引进推广这一条件不可缺少。而这些作物当时在山区受到青睐,与其对生长条件要求不高密切相关。在这样一系列相关因素组合而成的环境中展开的明清秦巴山区的资源开发,表现出一些显著的特点。进一步探讨这些特点,当有助于深化对明清时期山区资源开发问题的理解。

### 一、山区资源开发以外来流移为主体

外来流民入山的数量之大和流民在山区人口中的比重之高,已经在总体、宏观上决定了流移在山区开发中的主体地位<sup>①</sup>,因为,流民进山是为了生计。各州县人口的土著流移构成可能互有参差,但是,就山区整体而言,外来流移的数量大大超过土著老户

是可以肯定的。进一步对山区各类资源开发过程加以考察,流移的主力地位亦毋庸置疑。如土地资源的垦辟,“兼之深山穷谷,垦荒辟土者多异地之人”<sup>②</sup>,“盖汉南当鼎革之际,民皆倚担而立,如是者五十余年。其后开荒种地多属寄籍”<sup>③</sup>。“田无阡陌皆新垦,客聚湖湘本旧招”<sup>④</sup>。兴安、郧阳、太平、夔州诸府厅交界之大巴山东部,被“四方之民”“启之辟之”,以致:“昔之黄茅白苇,今则绿壤青畴矣”<sup>⑤</sup>。所谓“楚民善开水田”、“蜀民善开山地”更表明了流移在土地垦辟中的突出特殊作用。外来流移在山区水利建设中亦发挥过重要作用。

在经济作物以及经济林木的种植经营中,外来流移,特别是闽广流移的作用尤其不可低估。商州之山阳、镇安诸处,本有漆却不知割采,“惟南人割而沥之”,以至于逐渐“本地有效其术者”<sup>⑥</sup>。汉阴、紫阳一带的茶叶生产在明代所以有所发展,也是由于“流移到彼,不可胜纪,见今开垦日繁,栽种日盛”,“茶园加增,不知几处”<sup>⑦</sup>。闽广等地商品经济发达程度较高,有种植、经营经济作物和经济林木的传统,商品经济的观念也比内地特别比山内居民要强烈,这些地区流移的到来,对山区商品经济的影响较为显著。

“川人伐木共结林机，闽客开山自养蕈树”，反映了流移、客商在山区木、铁、耳、纸诸厂开办，竹木、矿产等资源开发中的地位。类似的还有严如煜《黑河吟》对客民开发黑河栈坝林区的记述。“棚居杂吴语，板屋半楚咻。气寒地硗确，稻黍种不收……铁炉排火化，矿石红于榴。斧斤纵栈坝，材木堆山邱。”他又说：“山中木、荀、纸、耳、香蕈、铁、沙金各厂，皆流寓客民所藉以资生者，而木厂为大……间有开厂只作枋板、猴柴，则客商资本未裕也。”<sup>⑧</sup>在许多地方的多数行业中，投资者为客商，佣工者亦大多为流移。洵阳县之耳炭、板、药诸机中，除药机之外，“其余各机亦如稞（同租）山者然，俱系客户给稿立券，预写木尽留山，木尽留土字样”<sup>⑨</sup>。通过租佃形式获得山地资源开发权，是当时流移客户开发山区资源的一般形式。

由流移充当开发山区资源的主体这一特点，给山区资源开发、经济增长乃至生态环境演变、社会变迁等过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二、山区资源开发过程中的盲目、过度倾向

在急切的生存压力驱动下，由生计无着的贫困流民、移民为主体的开发活动，无可避免地带有不同程度的盲目特征。有些资源的利用显得非常勉强，尤其是农耕土地的垦辟，的确是在争、是在夺。这种争、夺在当时是全国性的。所谓与山争地、与水争地、与草场争地，无处不在争。许多不宜农耕的土地被垦辟为农田。具体到山区、山地而言，明代已经出现了“深山穷谷，石陵沙阜，莫不芟辟耕耨”的情况。山中各地的方志中往往可以看到一些记述本地耕作条件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明我们的论断。鄂西北山区中之宜昌、归州、兴山一带：

山石硗确，地无平衍，农不宜谷，蚕不宜桑，仅资桐、茶、黍、粟、漆、蕨以为生理<sup>⑩</sup>。

农人勤于播种，而山田硗确，刀耕火种，牛力难施。五日雨则低田涝，十日晴则高田旱，惟坪田则否<sup>⑪</sup>。

鄖阳山区：

崇山峻岭，水险滩高，农民服田力穡，较他处尤为勤苦。开山辟土，专恃人力，理有固然，而水利之难，奚啻倍蓰？近山则渠路易塞，滨河则洪水易刷，然刀耕火种，习以为常，终岁勤动，作息相忘，服先畴者无论矣<sup>⑫</sup>。

川东北云阳、大宁山区：

山峻而陂，川陷而深，其顷亩俱依山负壑而垦治，非有沃壤如平原一望者也。故雷雨则满盈，名曰雷公；雨泽则有秋，名曰靠天；一遇小旱，尽为赤壤，名曰舍种。故终岁勤劳，登场即苦饥矣。<sup>⑬</sup>

地多硗确，刀耕火种，牛力难施。五日雨则低田涝，十日晴则坡地干，惟活石膏腴之田，不忧水旱。而山川险阻，沃壤平畴不过百分之一，故虽终岁劳苦，丰年亦鲜盖藏。土瘠民贫，良有以也。<sup>⑭</sup>

大巴山麓之紫阳、西乡、砖坪一带：

崇山峻岭，民所耕以为食者，皆陡坡石磧，旬日不雨则苦旱，久雨则又苦涝，甚或奔溃冲崩。<sup>⑮</sup>

路角涧滨，无跬步之地不垦，其用力勤矣，而戴土之山，先涝而溃，未暝而龟，偶有丰收，亦无宿蓄。<sup>⑯</sup>

高山邃谷，东路地更硗瘠，全赖天雨。西南巴山老林高出重霄，流民迁徙其中，诛茅架屋，垦荒播种，开辟大半。惟老林之旁，地气高寒，只宜燕麦、苦荞，即包谷亦不能种，民食颇为艰窘。<sup>⑰</sup>

陕楚交界之白河县：

白河山乡险峻，跬步皆难。闻农人种田之用牛者，百中只有一二，其余皆高坡陡立，耕牛不能施展，仅恃人力一锄之力与瘠地争功。以故本邑之粮，断不敷本邑之食，乐岁且尔，遑论荒歉乎！<sup>⑱</sup>

川北广元、昭化一带山区：

龙潭至广元县（75里），历二十四坡，路尤诘曲，山多童赭戴寸土，居人锄而种之，麦长四五寸即实。<sup>⑲</sup>

以上之所以不厌其长地引录了多处记载，目的就在于想把其中蕴含的如下信息传递出来：

第一，山中已经垦辟、正在耕种的土地之中，有一部分并不适宜农业耕作，尤其不适宜粮食作物生产，勉强耕作，不仅劳作非常艰辛，如兴山“地无平畴，坡尽陡立，耕种时皆攀援上下，俛锄涧壑，仰耕烟务”<sup>⑳</sup>，而且效益极差，如西乡新垦辟之老林地，连玉米都不能种植，务农者食物艰窘本身，就能够部分地说明问题。

第二，粮食生产非山中拥有的资源条件的优势。山中粮食不充裕，非由于人力未尽，而在于地利欠

宜。所谓“无跬步之地不垦，用力勤矣”、“丰年亦鲜盖藏”、“偶有丰收，亦无宿蓄”，甚或“终岁勤劳，登场即苦饥”，并非“无病呻吟”式的叫苦。

第三，制约山内粮食生产的主要因素是水利，而在当时条件下，似乎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

第四，桐、茶、漆等经济林木，特别产品曾经在山区人民经济生活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应该是山区资源条件的优势之一。

这里，还有一个没有明确传递出来的信息，即人口问题，何以“无跬步不垦”？何以垦及“高出云霄”的高寒山地？乃人口生存压力驱动的结果。农业垦殖扩张到大面积耕种粮食生产效益很差的土地这样的程度，其始初的动机恰恰是为了多生产粮食。越是想扩大粮食生产，扩大粮食生产的效益就越差，这就是明清农业垦殖所走的艰辛、曲折的道路。

### 三、山区资源开发经营的粗放化

这一特点在山区资源开发过程中表现相当充分，如刀耕火种般垦辟土地：

山中开荒之法，大树颠缚长绳，下缒巨石，就地斧锯并施，树即放倒，本干听其霉坏，砍旁干作薪，叶植晒干，纵火焚之成灰，故其地肥美，不须加粪。<sup>①</sup>

乾隆《洵阳县志》亦载有开荒种地之法：“其初灌木林列，足不能驻也，则芟夷而蕴崇之，法先斩其卑植者，然后用高岗所伐之木击之使下，其不能下者则用雍氏火化之法，沃之使肥而已”。不论大树小树，一火了之，根本没有考虑林木之价值，实乃对森林资源的浪费甚至破坏。在土地垦辟及材木采伐过程中，森林资源的浪费相当严重。黑河栈坝老林中出产花梨木、杂木、松柏、杉材，质量优美，但由于“挽运维艰，供爨薪而已”<sup>②</sup>。山中木厂所产猴材，“将圆木四劈、两劈，每块重四五十斤”，这仅长二三尺之木，几劈以后尚重五十斤，其径想必不小。

更值得注意的是经营的粗放化，在农作上表现为对耕地用而不养。连续耕种数年，地力下降，垦殖者并不采取养护措施，而以不断扩大垦殖范围，更换耕种空间为惯常。史称山民垦山：

挖土既松，水雨冲洗，三四年后，辄成石骨，又必别觅新山，抛弃旧土。<sup>③</sup>

前揭《洵阳县志》开荒之法后亦接着说：“数年地薄，则又转徙而之他”，本地垦种已遍，复徙往其他州县。这样的垦殖主要通过空间的扩展来换取一定的种植效益，缺乏深度利用、多层次开发和精耕细作的观念

和措施，事实上等于纯粹以消耗、牺牲自然资源来取得经济增长为主要途径。

相同性质的问题在手工业经营中也有体现，如铁厂等对柴的利用，就近老林开厂，而老林烧完之后，此铁厂之生产亦随之寿终正寝，极少见到有大面积林木更新之记载。

山区资源开发利用的粗放化与许多因素相关联。如开发主体一流移的流民意识的影响。这里的流民意识，大体上类似道光《石泉县志》中所说的“首邱之念”，简单说就是不忘故乡，并怀有返回故乡之念头。与此相应，流移在山内落居之地往往有客居感觉，并不完全真正以居地为家。这种流移意识的影响广泛深远。不少流移、客民不断变换居地，“今年在此，明年在彼”的行为便与流移意识相关。反映到资源开发过程中，就很容易把开发当做索取，甚至发展到极至而成为掠夺。试想在山区开发的主力军中，有一批以“过客”自居的人，那么，不想长远、不顾后果的急功近利行为就在所难免了。像洵阳县木、纸、耳诸机租给客户经营那种类型，索取化的开发是可想而知的，租约中注明“木尽留山、木尽留土”字样是必然的。因为，流移意识又加之佃户观念，影响更为强烈。正如《石泉县志》所云：“十年种树，其利不在目前，定难责之棚民佃户。”甚至连储粮备荒这样有关切身利益的事情也受到流移意识的严重影响。

山区资源利用的粗放化与玉米、马铃薯等作物亦不无关系。如前所述，玉米、马铃薯等生长条件要求低，它们与山区新开山地的结合，本身即蕴含有粗放化经营的因素，如果相对于稻作而言，就更是如此了。玉米、马铃薯在山区受青睐，反映着山内居民对生活质量要求的降低，更多地求量而较少重质，当然，这是被动的。清嘉道以后，马铃薯的种植越来越广泛，许多地方都有“马铃薯下山”的记载。也就是说，早期“低山种包谷，高山种洋芋、荞麦”的作物布局又有变化。

(凤县)低山种包谷，高处宜早荞。近则广种洋芋。<sup>④</sup>

(定远厅)高山之民，尤赖洋芋为生活。道光前惟种高山，近则高下俱种。<sup>⑤</sup>

(太平县)洋芋初惟高山种之，近年低处亦有。低处洋芋隔年点种，行间尚可匀点包谷。五月洋芋成熟，包谷渐长，可收两季。<sup>⑥</sup>

洋芋下山也可能有其他因素起作用，但是，对生产量的追求胜过对质的要求这一趋势无疑在加重。

#### 四、山区资源开发、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

这种不稳定从时间上可分别以长时段和短时段加以考察。短时段、局部的不稳定甚或反复，与山区人口的流动、不稳定密切相关，有时人口流动和经济增长不稳定互为表里。如由于收成不好而引起的人口流动等现象。紫阳“一值水旱则饥馑相仍，徙而他适，故流寓多而土著少，盖有由也。”<sup>②</sup>在宝鸡，“山内多系川楚贫民佃种山地糊口，缘山内砂石多而土少，各就有土之处垦种，即于其处结茅栖止，零星散处，迁徙无常。”<sup>③</sup>洵阳“数年地薄，则又转徙而他”。凤县“客民转徙，忽来忽去”。光绪初年，山外大旱，山内丰收，客民增多；光绪十二、十三年，山内秋雨太多，加之野猪为害，贫民远徙。到光绪十七八年，“秋收大熟，野猪稀少，客民复回，争地而种”<sup>④</sup>。这种开发的不稳定，显然与流移意识、开发粗放化的特点相互关联。流移在一块土地上耕种若干年后，由于地力消耗，收益减少而转徙他处，有的场合，“俟其草木茂密，砍伐烧灰，然后再行耕种”<sup>⑤</sup>，形成反复垦殖、利用。而前述水土严重流失以至于“辄成石骨”之地，却难以再次垦殖。能够有较充裕的土地以供抛荒轮种，当在开发早期地广人稀之时。流移不断转换垦殖空间，反映到资源开发利用上，即表现为不稳定。

长时段的考察则着眼于资源开发、经济增长的大波动，嘉庆初年的三省白莲教起义的影响为众所周知，而我们更注重的是道光以后山区经济增长的迟滞甚至衰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粮食生产停滞及衰退的记载颇多，如竹溪，“昔地广人稀，素号饶裕，今垦辟益多，硗瘠日甚，乐土其可长恃耶？”<sup>⑥</sup>如紫阳，“近来民生日繁，地日浇薄，各粮所出，渐见减少。”<sup>⑦</sup>自然灾害经常袭击山区，部分手工工厂也受缺粮制约而停工。

山中开发竹木、矿、盐等资源的工厂中，有不少先后停办。光绪《洋县志》称：“其在中，昔时香菌、木耳、铁、纸、木料等厂，今皆无之，惟纸厂尚余二一。”山中各厂，受资源开发方式等影响，早在道光年间已经显露出衰退的势头。卢坤《秦疆治略》所载较之严如煜所记已有减少。如纸厂，严氏云“山内西乡纸厂二十余座，定远纸厂逾百，近日洋县亦有小纸厂二十余座。”到道光初年的《秦疆治略》中，定远纸厂仅四十五处，洋县则未见记载（可能是漏载，没有纸厂的可能性很小，因光绪《县志》尚称“纸厂尚余一二”），只有西乡纸厂由二十余增加到三十八。光绪

《佛坪厅志》对清晚期的工厂衰落也有反映。“厅治向有板号、铁厂、纸厂，自兵燹后，无复业此者。惟蓄耳树收伏耳，养蜜蜂收蜜蜡尚获利焉。”<sup>⑧</sup>

山区经济作物与经济林木的经营状况相对好些，但亦有衰退者，如茶叶生产，光绪年间，由于价格低廉、运销不利等，紫阳县出现了毁去茶树的现象。道光《宁陕厅志》作者对山中之林木、割漆、练纸瓢、采药材等生产活动前景也表示忧虑，“人烟渐以众多，山林日见开削，其利亦不能久恃矣。”

与当初大量流移进山促动山区资源开发、经济增长出现高潮相反，山中粮食生产的萎缩、手工业的衰败，导致大量山内人口又返流到山外。在宜昌山区，同治《宜昌府志》云：

州设流以后，常德、澧州及外府之人入山承垦者甚众，老林初开，包谷不粪而获，每市斗价值四十文，较官斗仅值二十文。迨耕种日久，肥土为雨潦洗净，粪种亦有不能多获者，往时人烟辐辏之处，今皆荒废。

在陕南武都山区的凤县一带：

嘉道之间户口繁庶。光绪初年旱荒，山外旷地多，老林地力渐薄，棚民则外徙，势使然也。<sup>⑨</sup>

遇到自然灾害打击，山内人口流往山外者更多。光绪八年，高山歉收，有白河等处居民“百十成群逃赴山外趁荒。”<sup>⑩</sup>光绪十六年，秦巴山区普遍受灾，尤其是对马铃薯生产影响显著，芋种糜烂，高下无收。于是，“川楚客民有家可归者，皆已迁回原籍，本年四五月，粮价奇昂，目睹洋芋复坏，襁负流徙者又已不少”<sup>⑪</sup>。乡土志中有“高山棚民一往而空”<sup>⑫</sup>、“地之昔辟而今荒者，十居四五焉”<sup>⑬</sup>之记载，可知灾情之重，打击之大，人口外流之盛。所见光绪间所修凤县、定远、宁羌等州县方志中所载人口数，大多较道光初年有所减少，列出以供参考。

| 州 县 | 道光三年人口数 | 光绪间人口数 | 对比值     |
|-----|---------|--------|---------|
| 南郑县 | 262000  | 170256 | -91744  |
| 凤 县 | 173400  | 42087  | -131313 |
| 定远县 | 134800  | 87596  | -47204  |
| 宁羌州 | 46600   | 65076  | +18476  |
| 平利县 | 178600  | 144985 | -33615  |
| 合 计 | 795400  | 501000 | -294400 |

资料来源：卢坤《秦疆治略》；光绪《定远厅志》，《凤县志》，《宁羌州志》，《平利县志》；民国《南郑县志》。

清代后期山区经济增长的停滞乃至衰退,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战乱、自然灾害等。但是,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山区内部,结合山区资源开发、经济增长的特点及内部机制来综合考察,才能有一全面的把握。

#### 注 释:

- ① 参见拙作《明代秦巴山区的封禁与流民集聚》,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
- ② 乾隆《南郑县志风俗》
- ③ 道光《石泉县志》卷4
- ④ 张深:《署宁陕厅抚民同知即事》,见道光《宁陕厅志》卷4。
- ⑤ 《新设砖坪县丞衙门记》,见乾隆《兴安府志》卷26。
- ⑥ 康熙《雒南县志·物产》,乾隆《镇安县志》卷7。
- ⑦ 杨一清:《为修复茶马旧制第二疏》,见《明经世文编》卷115。
- ⑧⑨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9、卷11。
- ⑩ 乾隆:《洵阳县志》卷11
- ⑪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75
- ⑫ 同治《宜昌府志》卷11

- ⑬ 同治《郧县志》卷2
- ⑭ 嘉靖《云阳县志》卷上
- ⑮ 光绪《大宁县志》卷1
- ⑯⑰⑱ 光绪《紫阳县志》卷1、卷3。
- ⑲ 道光《紫阳县志·序》
- ⑳㉑ 卢坤:《秦疆治略》
- ㉒ 《陕境汉江流域贸易表》,卷下。
- ㉓ 高延第:《北游纪程》咸丰
- ㉔ 同治《宜昌府志·风俗》
- ㉕ 嘉庆《汉南续修府志》,卷1。
- ㉖ 严如煜:《复查山内匪徒禀》,见《乐园文钞》,卷7。
- ㉗㉘㉙ 光绪《凤县志》卷1、卷3。
- ㉚ 光绪《定远厅志》卷5
- ㉛ 光绪《太平县志》卷2
- ㉜ 《营田议》,见《乐园文钞》卷7。
- ㉝ 同治《竹溪县志》卷15
- ㉞ 《佛坪厅志·杂记》
- ㉟㊱ 《童温处公遗书》卷2、卷3。
- ㊲ 《镇坪乡土志》
- ㊳ 《留坝厅乡土志》

(责任编辑 吴友法)

## Mountainous Resource Exploitation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Zhang Jianmin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uthor:** Zhang Jianmin (1959-), male, Professor, Doctoral supervi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mountain areas is very important in the exploit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ake the Qinling-Daba mountain areas as an example, the exploit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a large scale is not only closely related with the complicated background and conditions including the rapid increase of nation-wide population and of the pressure to subsist, the introduction and wide planting of new agricultural plants, but also possesses some obvious features, such as the main subjects of the exploit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being immigrant population, obviously blindness and excessiveness in the exploitation process, the extensive exploit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xtensive cultivation, and the unstability of economic increase, which leads to the serious lack of reserve strength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in mountain areas as well as the emergence of stagnation and decline in an early period and provides us with som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in our contemporary economic construction.

**Key words:** development of mountain areas; immigrant population; blind exploitation; unstability